

-georg & adorno matthew arnold walter benjamin harold bloom jacques
is frieta wilhelm dilthey emile durkheim michel foucault sigmund freu
el leo georg gadamer martin heidegger edmund husserl fredric jameson
s friedrich nietzsche richard rorty jean-paul sartre georg
el leo strauss max weber

晚期资本主义 的文化逻辑

[美] 詹明信著 张旭东 编 陈清侨 严锋等 译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主 编 甘 阳

副主编 苏国勋 刘小枫

晚期资本主义 的文化逻辑

[美] 詹明信著 张旭东 编 陈清侨 严锋等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美) 詹明信著；张旭东编；
陈清侨等译. — 2版.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SBN 978-7-108-04331-3

I. ①晚… II. ①詹… ②张… ③陈… III. ①资本主义—文化哲学—文集 IV. ①G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0807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98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2版

2013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5.625

字 数 375千字

印 数 10,001—15,000册

定 价 36.00元

目 录

再版序.....	1
编者序言.....	1
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	1
——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访谈（代序）	

上编 理 论

文本的意识形态	43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	118
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	158
——主体的位置与精神分析批评的问题	
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	212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224
德国批评传统	245
法国批评传统	262

下编 境 遇

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	277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	324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344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423
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448

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

——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

一 理论的历史性

张旭东：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个人“理论语言”的全貌以及您“方法论”的构成。一般人看来，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继而创造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批评风格。您能否谈谈当代“理论”发展中不同取向相互渗透的过程，以及这种渗透在您本人工作中的表现？

詹明信：这里有几桩事情需要交代一下。首先，我们所泛称的“后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而是包含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内容。它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我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以法国情形为例，“二战”后主导法国思想界的当然是存在主义。但它很快变成了马

* 1995年12月31日，于芝加哥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

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而结构主义的问题性正是在此刻开始凸显的。我所指的不是结构主义本身的立场，比如语言是人类意识活动的最终决定因素之类，而是它所探讨的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一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生发出来的。战后，马克思主义在寻求一种更为贴切精微的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所有具体的后结构主义题旨都来自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还要补充一点：我近来还对另一种重要的影响来源深感兴趣。这便是布莱希特的影响。布莱希特在1944、1945年间在柏林布莱希特剧院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尽管人们一般并不把布莱希特视为哲学家或理论家，但他的辩证思想却为日后的后结构主义明确了任务，这就是反人道主义。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两种事物的猛烈攻击。一是对经典资产阶级传统的攻击（而卢卡奇则为这一传统辩护）；一是对所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攻击（卢卡奇显然又是这一观念的倡导者）。这种反人道主义在阿尔都塞等人手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阿尔都塞写过关于布莱希特的文章，两者间的联系是清楚的。人们也都知道一些问题是由布莱希特提出的。

我所要强调的是，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而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你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在战后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本质的问题，表象的问题，等等——是他们各自议题中的基本因素。

这也可以说明另一个让某些人感到吃惊的现象，即德里达为何要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一两年前我们都看到了德里达谈马克思的书（按：指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英译本题为 *The spectres of Marx*）。我认为原因是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以后——现

在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大理论家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再强调一次：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德勒兹的情形亦是如此，尽管不幸的是德勒兹生前未能写成他的论马克思的巨著。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德里达的补救工作带有一种多重性：一方面他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要介入一个目前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再者，他也在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本人的思想也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这一基础发展出来的。这一切把他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至于你的问题在当前理论界的具体反映，我想这同“理论”的本质有关。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出现于一种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理论总不免要变成不同的理论商标。如果有人觉得这么说太不恭敬，那么我们可以说理论往往以多种“名牌理论”、“个人习语”或“私人语言”的方式存在。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观念统统吃进，再赋予其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可能的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同时操起各式各样的理论语言。我们找不出什么将这些语言综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种万能语言（*master language*）的办法，而我们甚至连这样做的欲望也没有，这就造成了你问题中所暗指的局面：一个人现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可是一转眼又说雅各布森的语言，或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或拉康语言。人们常常指责我在这一点上搞折中主义，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在语言上着眼。这就好像有些事情只有用法语说才清晰有力，有些事情只有德语才讲得明白，到了法语里就一塌糊涂，而又有有些事就非用中文不行。理想状态应该是随你所讨论的问题而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但这几近于不可能。从

这一角度看，我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某些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联极为密切，尽管这种关系并非一眼就可以看破。

讨论这类问题必须重构具体的历史环境，否则很难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希望在我说明这些复杂问题的同时，这些说明也可以用来引导我们进入一些更为基本的理论、哲学问题。但我必须标出各式各样的名字，否则就像是我把这些观念都算在了自己的份上。事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毫无疑问在这些哲学指涉的镜像中，不了解原始材料就会晕头转向。

张旭东：人们通常觉得您一半是“法国”的，一半是“德国”的——前者指后结构主义，后者指法兰克福学派。现在您告诉我们这个“法国”并非只是同“辩证批判”相对立的种种语言学、符号学和“理论”，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一部分。

詹明信：对，是这样的。我在学生时代就可以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并接触到法、德两种学术思想传统。但这纯属个人背景上的偶然因素。人们往往习惯于在法、德两种传统间选择，或扬“法”抑“德”，或扬“德”抑“法”。我一方面觉得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另一方面也觉得它非常古怪而可悲。前面已经说过，我并不认为严丝合缝的综合可行。同时我也不觉得借用来借用去是个成功的办法。以阿多诺在法国70年代的借用为例，人们当时把“反同一性”的阿多诺列在后结构主义的名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对阿多诺思想的歪曲。此类结合并不如意。如何在不同立场间对话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人们不妨回忆哈贝马斯与福柯的对话，或乔姆斯基与福柯的对话。除了在一些基本的政治、文化问题上，在这些语言间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德、法传统两者都是伟

大的哲学—理论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或许可以算一个欧洲中心论者。我的思想只是碰巧形成于这样一种氛围。因而英美思想——经验主义、日常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诸如此类——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障碍，用保罗·德曼的话，是“对理论的抗拒”。所以，客观地讲，我对这些东西并不热衷。我认为自皮尔斯以来在英美传统中有极为有趣的东西，但我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是来自德法的。

张旭东：这里我想打断一下。我相信把您当前的理论框架放在历史语境里谈会对读者有所裨益。但在西方理论中心之外，人们仍倾向于用一种更为粗疏的意识形态眼光来看问题，把多种立场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野来安排。您能不能谈谈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战后自由主义思想或立场的关系？

詹明信：战后西方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所界定的。在这一点上，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本身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对于西方左派来说，自由主义从来都是信誉扫地的。不过目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的回潮。它们身上的污点相对较少，因为至少它们不用在口头上口口声声反共了，无论它们在更深一层的政治信仰上有什么变化。但很清楚的是，我们（按：指西方新左翼）从来不指望自由主义能提供任何激发思想的东西，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冷战自由主义，只不过在哲学上涂上了英美哲学的色彩。

张旭东：我想您理解这个问题时我们关心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结构性关联，而是人们乐于从激进—自由—保守的立场分歧看问题的旧习。

詹明信：我完全理解。这是生存策略，人人都会这么做。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从哲学问题本身开始，然后，或者说最后，再来决定这些问题是出于激进主义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所有这些后结构主义问题都可以在所有这些方向上反映出来。最终人们必须做出政治上的判断，我认为这至关重要；但问题应该首先从其内在的观念性上予以分析和讨论。对艺术作品亦是如此。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不过这也使我的立场在某些人看来颇为暧昧，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

张旭东：在您的哲学——理论构成方面，我想问问海德格尔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同时也想请您谈谈海氏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的地位。

詹明信：各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我50年代在德国求学。海德格尔好像是在1951年被重新允许执教的。我那时所了解的德国在思想界由海德格尔的思想支配。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来得要晚得多。在法国，海德格尔也有他的信徒。前往德国黑森林拘禁海德格尔的法国士兵都要求他签名留念。但海德格尔对整个法国思想界的渗透要慢得多。在此必须提到德里达，是他把海德格尔的某些方面提上议事日程的。这个海德格尔并非德国人了解的本体论的海德格尔，而

是“颠覆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其角色非常不同。把德里达视为海德格尔主义者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德里达绝对不持有任何本体论方面的立场。他对此不感兴趣。在他看来那是海德格尔可悲的一面。然而海德格尔对于消解哲学的运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海德格尔也置身于同样的历史性问题之中。这一切很复杂。我看海德格尔目前在德国基本上是过眼烟云了。眼下的德国几乎笼罩在哈贝马斯的影响之下。当然现在有美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在美国海德格尔是个颇为景气的行业，不断有新的文稿面世。我本人的思想形成受萨特的影响很大，因而有许多海德格尔的东西我并不需要，因为我已从其萨特版中了解了。

不过我觉得海德格尔思想中某些成分同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这就是所谓实用的海德格尔：这个海德格尔大谈工具和生产。这为“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打开了局面。而这一领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白。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一直没能得到发展。（不过阿尔都塞及其学派认为“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但这毕竟是海德格尔的一个方面。海德格尔还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颇具吸引力。在萨特中这一方面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整个对“定在”（Dasein）的看法，即把它视为能动的、第一性的因素（它只在后来才具备“思辨”的特质）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显得生动而有益。

张旭东：您如何描述海德格尔在您著作中的体现，或许我应该先问您是否认为海德格尔存在于您的作品中。

詹明信：我在德国读书时念海德格尔念得十分认真。不过我一直更

倾心于《存在与时间》，即存在论的海德格尔，而非后来的“本体论”的海德格尔。但我一直认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极具魅力，只要你把它理解为一种乌托邦精神，而非对世界的描述。顺便一提，我认为这是整个现象学的问题。现象学的目标是乌托邦，而非事实存在之物。但海德格尔也有一个大问题，即有关现代性和技术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哲学上的答案，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标明在那里。他的 Ge-stell 概念是如此神秘，以致至今无人能敲开这个硬壳而找到某种现实的问题与观念。但这的确是海德格尔觉得很重要，很需要思考的方面。显然，整个后现代性问题及其新的技术形式，比如控制论之类，使得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但这也许并不是海德格尔所想到的。总之，我或许可以说在我一生的不同阶段，我都是海德格尔的同路人，而在最近几年里，我对他的兴趣变得更强烈了。不过我不能说海德格尔对我工作的影响最为强烈，除了他的有关主动性、生产、实践等概念。

张旭东：所以人们应该把散见于您文章中的“存在”“去蔽”等字眼理解为某种乌托邦观念的标记。

詹明信：对，正是如此。我想我是用这些字眼来戏剧性地标示出一个乌托邦的空间。不过这不是我唯一可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从乌托邦的角度看，“存在”在根本上说是人类存在和自然存在，因而社会领域就被剔除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有用。

张旭东：近来人们似乎越来越有兴趣讨论和描述您的学术生涯和思

想发展。在不少人看来，它们简直是奇迹。比如麦克埃布（Colin Maccabe）在为您的《地缘政治的美学》（*Geopolitical Aesthetics*）一书所做的序中，就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描述或总结了您的治学道路。大体上说，他把您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头二十年是通过评价德、法理论传统而“耐心”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前提，然后以《政治无意识》为转折，则是一场“爆炸式”的文化批评攻势。按他的说法，这一切是一场精心的自我设计和理论战略。

詹明信：我很感谢柯林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一幅整体画面。目前这样做的人并不多。但我有些疑心柯林有意对我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或政治因素轻描淡写。我无意自己讲自己的故事，而且我看得出他的描述自有其说服力。但我自己恐怕不会这样讲。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向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对个别文本的探讨总是以理论上的冲突为前提的。因而“爆炸式的文化分析”也可以用在我的文学工作方面。也就是说，在哲学一方法论方面与阅读个别文学文本方面之间的冲突，同哲学一方法论与阅读大众文化文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从某种经典看法向某种更倾向于大众文化、文化研究的方向转变。也许近年来我在电影和大众文化方面写得较多，但同时我也有好几篇很长的文学和理论分析尚未发表。这些文章的路径就非常不同。我并不想把这两方面合二为一，不过我认为真正的摆动可以说发生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发生于具体的解读与更为一般的理论探讨之间。我并不觉得我是先把自己的理论工夫修炼到家，然后再转向具体分析。在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在这个后现代时代，人们以往在现代性的世界里所进行的理论

思考本身必须予以重新考虑。而这亦是我们目前的理论工作。许多思辨性的问题还远未解决，现在还不是沉溺于“阅读文本”的时候。理论仍在途中，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工作。

张旭东：我想可以从麦克埃布的文章中引申出来的是：人们能够在观念上暂时专注于某些理论—哲学的“基础设施”；一旦这一基础工作告一段落，它便可用作某种思考的模式和动力，使人不致迷失在四分五裂的现实中。

詹明信：我在《政治无意识》里描绘了三种不同层次上的语境，提供给人以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框架。人们可以专注于直接的社会历史层面，在此我们面对诸如福利国家的全面倒退这样的问题。我们亦可以从更大的方面着眼，探讨阶级间的互动关系。事情在这个层面上的变化就相对较慢。问题包括阶级的历史，不同阶级对于他们以往的斗争与失败的记忆，等等。最后，我们则要面对生产方式这个最大意义上的语境。因而这里已经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语境并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此时此刻，而是需要在更长的时段上加以考虑的问题。当然我们引用的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不同时间性的观念。我并不常常写具体的政治斗争方面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因为艺术作品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工，同时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加以分析和阐发。只有在大众文化领域里我们才会有立即的回应。在如何表现这些直接的、立即的反应方面长期来有许多陈旧的成见。然而就是这一领域在那些朝生暮逝的文化或政治现象中也同样有一种时间滞后的效应。我并不认为我本人擅长做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因为我的思想形成于外国语言之中，而不是在所谓“美国研究”领域。

还要补充一点。这是我从卢卡奇那里学到的。卢卡奇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其中最宝贵的观念之一就是艺术作品（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有时在这个场合人们能比在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中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我想我会抵制把美学和历史语境分别对待，然后再捏合在一起的做法。人们往往以这样的眼光看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这也无须责怪，因为我的确是在同时关注审美的和非审美（或外在于审美）的事物。而这两者之间常常会出现裂隙。较为拙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往往会在处理社会主题和处理形式、意识形态主题之间造成断裂。但从原则上讲，把社会历史领域同审美——意识形态领域熔于一炉应该是更令人兴趣盎然的事情。因为它带来了写作批评文章本身的形式问题，而在这方面谁也没有现成的灵丹妙药。总之，卢卡奇对我来说意味着从形式入手探讨内容，这是理想的途径。

不过，卢卡奇与布莱希特等人从反面的批评的意义上加在卢卡奇头上的人道主义之间的不同在于，卢卡奇谈的总是成功的、为人所把握的形式。而在我看来我们一样应该注重种种失败的形式，注重某种再现方式在特定语境中的困难甚至不可能性，注重形式的残缺、疏漏、局限和障碍。在我看来，形式的失败，而非老卢卡奇意义上的成功，可以成为导向某种社会意义和社会真实的线索。

张旭东：您所说的“失败的形式”指的是先锋派的“艺术作品”还是大众文化产品？

詹明信：有意思的是两边都有这样的例子。或许一个探讨大众文化的有趣的角度是将其视为形式的失败和不可能性。同样，我们也可

以在所谓纯文学中谈这样的失败和不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一种更为妥帖的文化研究概念不应让人觉得要在“雅”和“俗”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研究经典作品了，就不能碰电视、流行音乐之类。在我看来，两者是一个整体领域中的辩证的组成部分。而最精彩的议论，往往是由那些不固守“精英”和“大众”，“德国”和“法国”之类的人为框框的人做出的。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要这样画地为牢，有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但这毕竟不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态度。

张旭东：我想您的读者大都能看到这一点，即在您的批评文章中“政治”和“美学”两者都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您文章令人信服之处。但我还是要问，“理论”在您的工作中是不是一个核心环节，在此，您不但获得了一种“哲学”形式和个人风格，也获得了某种权力、主体性、某种思维的原则。这使您能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事物进行解读和编码，并在叙述中保持某种一致性、连贯性和能动性。人们能说现在的文化语言是一种精神分裂的语言，而您却似乎不受此约束。这一切能不能反过来在理论中得到解释呢？又能不能同您在理论上的潜心研读联系起来呢？

詹明信：在此，我们同样只能给一个历史性的回答。我的早期理论著述（按：指《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及《语言的囚笼》）似乎是为我后来的文化分析铺平了道路。但当时它们却也产生于特定的语境中。那时，法国和德国的批评传统在英美世界都远非为人熟知，因而我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将这些理论大众化、“庸俗化”。在此“庸俗化”在法语里的意义是教学上的普及而已（笑）。现在，有